

# 近代中华书局

理科教科书文本研究

JINDAI ZHONGHUA SHUJU  
LIKE JIAOKESHU WENBEN YANJIU



覃兵 胡蓉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 近代中华书局

理科教科书文本研究

JINDAI ZHONGHUA SHUJU

LIKE JIAOKESHU WENBEN YANJIU



覃兵 胡蓉 著

本书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科学精神的传播——近代中华书局理科教科书文本研究与启示》

(11YJC880100)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华书局理科教科书文本研究 / 覃兵, 胡蓉著.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94-1577-8

I. ①近… II. ①覃… ②胡… III. ①理科(教育)一教材—研究 IV. ①G4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4058 号

### 近代中华书局理科教科书文本研究

著者:覃 兵 胡 蓉

责任编辑:曹 杨 靳鹤琼 责任校对:李 茜

封面设计:李 玉 责任印制:曹 靖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010 - 67078258(咨询), 67078870(发行), 67019571(邮购)

传 真: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 - mail:[gmcbs@gmw.cn](mailto:gmcbs@gmw.cn), [caoyang@gmw.cn](mailto:caoyang@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本:880 × 1230 1/32

字数:110 千字

印张:6

版次: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94-1577-8

定价:26.00 元

## 前 言

谁也不会否认教育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然而,这种作用的发挥,是通过培养人来实现的。作为教育最重要的工具,教科书又在其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由此看来,小小教科书的确是不能被忽视的。

然而,教科书却又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什么样的教科书是好的教科书?这样一个问题经常被提及,但却没有找到合理的答案。“教科书是很多学生最不爱读却又读得最多的书,是最畅销最不受欢迎的书,不得不读,可没准儿读了最终也是白读;教科书是被认为最有价值,可学生一旦毕业常被烧掉、撕掉、卖掉的可怜的家伙;教科书是连注释也要学生把玩研究吃透的东西。”<sup>①</sup>

教科书作为近代社会的产物,无疑是近代文化转型、教育改良和知识转型的重要渠道和载体。从近代教科书诞生的时候,它就和近代社会的文化启蒙、教育变革紧密相连:文化变革催生了教育制度改良和近代教科书;编纂者用教科书寄托了改造社会文化、塑造国民的希望;近代国家机器用教科书传输政权意志;社会思潮的汹涌澎湃也会在教科书中留

<sup>①</sup>刘云杉.学校生活社会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67.

下印痕，尤其是教科书自身发展所形成的较为完整的制度链条，以及它影响之广泛，使得它对于研究近代知识体系和思想文化的变迁，具有无可替代的解释力。对它们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对教育发展与演变的认识，而且有利于对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文化传统、科技水平、民众心态等多种因素的认识。

“清末民初教科书以其现代性内涵，在启蒙的地平线上撒播现代文明，塑造着国民新的世界观与价值取向：教科书传播西方现代科学知识，推动中国现代科技的创新和变革；宣扬现代民主自由思想，促进中国现代政治的觉醒和革新；提倡新的社会伦理观念，鼓吹社会文化的更新和发展；凸现生活生产建设之实用，呼吁社会民众求强和求富；弘扬爱国民族精神，激励国家独立和自主……”<sup>①</sup>

对教科书研究而言，以石鸥教授为核心的团队所进行的教科书影响颇大，该团队已出大量成果。从已发表的成果看，该团队对近代以来的教科书出版与编撰已进行了系统研究。2009年，石鸥教授所编著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勾画了我国百年教科书的发展史。

近代中华书局教科书是当时剧烈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产物，反过来又推动了近代我国社会的发展，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儿童，实践着服务国家教育的使命，潜移默化到受教育者的血脉深处，并最终影响到一个时代的发展，实现了“教科书革命”的目的。这样一种反差，虽

<sup>①</sup>吴小鸥.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启蒙诉求[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

然有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知识的表达方式和追求程度不同的因素,对此进行研究既是一种历史的回溯,也是对当今教育发展的一种促进。目前学界关于商务印书馆已有几种研究著作出版,而对中华书局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对中华书局教科书的研究普遍比较宏观,偏重于从出版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不同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力图揭示中华书局教科书发展的诸多影响因素,如新学制的颁布、教育方针的变更、教育思潮的演变、社会政治活动的变化等,并进一步明确其在实践新教育理念,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中的作用。如周其厚、荆世杰、李良品、郭春梅、吴永贵等研究者的研究成果。

理科教科书是中华书局教科书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在科学精神传播、传递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和推动中国近代科技创新和变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根据北京图书馆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合编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整理形成了近代中华书局理科教科书发展的基本线索。内容分析法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美国传播学家伯纳德·贝雷尔森将内容分析法定义为:一种对具有明确特性的传播内容进行的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技术。霍尔斯蒂对内容分析法做出了更具体的描述:“内容分析法是系统的、客观的指出讯息的特征”,且以“描述传播特征、推导传播者意图、推断传播效果”为主要目标。

本研究希望从内容上探讨理科教科书选择哪些知识、技能教给学生,是否体现了当时学科自身的逻辑要求、社会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学生心理发展特征和教育教学规律的客观要求,从模块结构分类、编排方式、语言表达、插图、版式

风格等方面是如何实现教科书教学工具的功能，是否体现儿童的认知特点，是否能够激发学习兴趣，使儿童能够理解和接受，是否与教学内容相匹配，是否能够激发学习兴趣和探索科学的动力，从而探索其在近代国民现代性启蒙、传播现代文明、塑造国民新的世界观与价值取向的作用，为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文明提供智力支持与思想传播，并最终影响到一个时代的发展，实现“教科书革命”的目的。

# 目 录

## 第一章

### 近代中华书局的发展与理科教科书研究维度

- |     |                    |    |
|-----|--------------------|----|
| 第一节 | 近代中华书局的成立与发展 ..... | 3  |
| 第二节 | 理科教科书研究维度 .....    | 21 |

## 第二章

### 民国初期中华书局理科教科书的兴起

- |     |                          |    |
|-----|--------------------------|----|
| 第一节 | 中华书局理科教科书兴起的时代背景 .....   | 33 |
| 第二节 | 民国初期中华书局理科教科书发展概况 .....  | 39 |
| 第三节 | 小学理科教科书内容特征解读 .....      | 47 |
| 第四节 | 小学理科教科书的表层属性解读 .....     | 58 |
| 第五节 | 民国初期中华书局小学理科教科书的影响 ..... | 72 |

## 第三章

### 新思潮下中华书局理科教科书的发展

- |     |                              |    |
|-----|------------------------------|----|
| 第一节 | 新思潮下中华书局理科教科书出版背景 .....      | 79 |
| 第二节 | 《新式理科教科书》与《新教育理科教科书》发展 ..... | 85 |
| 第三节 | 新思潮下中华书局理科教科书内容特点 .....      | 90 |

第四节 新思潮下的理科教科书表层形式	100
--------------------	-----

## 第四章

### 新学制改革下的中华书局理科教科书

第一节 新学制改革背景	109
第二节 《新学制适用新小(中)学教科书》(理科)的发展	120
第三节 《新学制适用新小(中)学教科书》(理科)的内容特点	124
第四节 《新学制适用新小(中)学教科书》(理科)的表层形式	132

## 第五章

### 新课程标准与修正课程标准时期的理科教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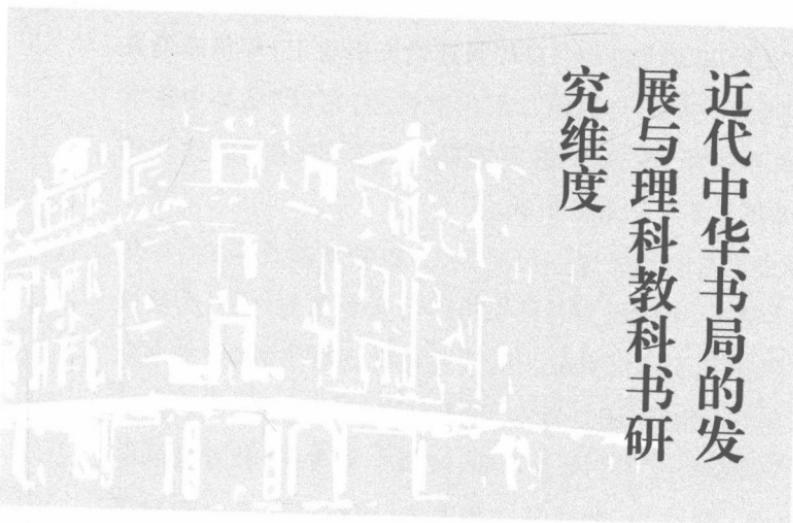
第一节 新课程标准与修正课程标准时期理科教科书发展背景	143
第二节 新课程标准与修正课程标准时期理科教科书发展概况	149
第三节 新课程标准与修正课程标准时期理科教科书内容特征	155
第四节 理科教科书表层属性分析	161

## 参考文献

## 后记

## 第一章

# 近代中华书局的发 展与理科教科书研 究维度



中华书局由陆费逵先生于1912年元月在上海创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在我国近代出版史上，中华书局是与商务印书馆并称的全国第二大出版机构，它以“弘扬中华文化，普及民智教育”为目的，在整理保存古籍、传承民族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中华书局与中华民国一起诞生，并以陆费逵先生的“教科书革命”为追求，很快成为教科书出版的重要基地之一，为我国教育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陆费逵在自己起草的《中华书局宣言书》中明确指出：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其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他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而教科书又为教育之本，他从“教科书—教育—立国”这一整体思路出发来考察教科书的重要性，认为，要想改革教育必须以改革教科书为突破口。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华书局教科书以其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严肃认真的编辑作风，一以贯之的服务宗旨，适应了不同时期不同教学对象的不同教学需要。它们在承载着知识传播重任的同时，也将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规范等文化因子，潜移默化到受教育者的血脉深处，并最终影响到一个时代的发展。

# 第一节 近代中华书局的成立与发展

## 一、中华书局成立背景

### 1. 市场背景

清末时期,由于西方传教士的涌入,国内有了新式教科书的概念。传教士出版教科书的行为激发了国人改良启蒙读物的意识。进步知识分子投入教科书改良的浪潮当中。由此,国人自编教科书开始兴起,近代教科书出版市场也逐步形成。

当时,学堂教育的普及、清政府对于教育的诸多改革,对新式教科书的出版有极大推动作用。戊戌新政时期,清政府对教育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新政最终流产,但“兴学”一项却得以保存。1901年,清廷发布兴学上谕,规定“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以推广新式教育。此后,清廷对教育实行了一系列改革: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学制,史称“壬寅学制”;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1905年颁布上谕,废除科举制度,使得学堂教育愈受重视。新式学堂的开设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即学生该用什么样的教材,新式教科书的需求急剧突显。蔡元培、张元济等人呼吁国人自编教科书。基于官方的教育改革,新式学堂的开始,以

及知识分子对于教育功用的进一步认识,国人开始了探索新式教科书编写的步伐。

最开始自编的教科书大多是新式学堂的教员为满足教学实践的需要自编的教材。但这类教科书最初只是为了满足学校教学之用,并没有明确的将之推广于市场的概念。由于新式学堂在国内广泛推行,新式教科书的需求量急剧上升,出版市场蕴含着巨大商机,因此各方力量纷纷角逐这一市场。一方面,教员自编的教科书逐步走出学堂,走向社会;另一方面,民间出版商也开始投入其中。由于教育的特性,官方也急于掌控新式教科书市场,一则可获利;二则可控制教科书内容和思想的传播,巩固其统治。同时,国人自编教科书与教科书译著热潮相互交织,推动着近代教科书向前发展。<sup>①</sup>因此,新兴的教科书出版市场呈现出十分活跃的气息。后来,随着一些带着商业性质的出版社的陆续转型,从商务印书馆转变营业方针,进入教科书市场,到文明书局的成立,再到中国图书公司的成立,短短数年的时间,教科书出版市场已天翻地覆,我国近代教科书出版市场也在这期间得以形成。

## 2. 时代背景

1911年的清王朝风雨飘摇,共和政体的发展态势日趋壮大。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取得胜利。随后,南方各省纷纷响应,革命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了清王朝的军队。

<sup>①</sup>何瑶琴.中华书局中小学教科书出版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2:6.

当时正在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部长的陆费逵，已经加入了革命团体日知会，且与革命党人有着密切的来往。因此，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陆费逵对革命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预料革命必定成功。作为出版人的陆费逵，在当时的形势下自然会考虑到如果革命军成功推翻清政府后，新政府必将对教育系统进行大的变革，而作为直接服务于教育的教科书也将面临巨大的变革。因此，在上海光复后的第三日（即农历九月十六日），陆费逵与陈寅等人，便秘密协商组织公司事宜。基于对出版行业的认识，他们认为革命一旦成功，则市场上现存的教科书必将被淘汰；然而革命期间，社会各方自然都将注意力转移到战事之上，必将忽视新式教育和教科书的出版。因此，如果革命真的成功，那么市场上将没有可用的教科书。在这种考虑之下，陆费逵等人决定编辑一套小学教科书。<sup>①</sup>

当时，陆费逵、戴克敦均是商务印书馆的员工，他们秘密编印教科书的举动也可反射出当时商务印书馆高层对于革命的态度。尽管革命爆发以后，商务印书馆一些有志之士有编辑教科书的打算，但作为当时最大的民营出版商，在革命前途未卜之际，贸然准备新式的教科书是一种巨大的冒险。首先，企业要承担的是巨大的政治压力，万一革命失败，筹备教科书的消息走漏，企业将面临倒闭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商务印书馆采取了求稳的策略。其次，张元济先生对于政治局势的判断，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企业的决策。作为“百日维新”的亲历者，张元济先生亲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最终选择弃官从商，志在以扶助教

<sup>①</sup> 陈寅. 中华书局一年之回顾[J]. 中华教育界, 1913(1).

育为己任。这种经历使其对政治的态度趋于保守。面对同仁编辑新式教科书的建议,张元济“提及革命,总是摇首”,认为革命不能成功,教科书不用改。

正是因为商务印书馆的迟疑,给立志于服务教育,以教育提高民众素质的陆费逵进入教科书市场创立中华书局创立了一个极好的机遇。可以说,辛亥革命赋予了教科书出版一个巨大的商机,而商务印书馆对于革命态度的迟疑则让陆费逵等人有机会进入这个市场,从而有了后来的中华书局。

### 3. 个人因素

陆费逵是中华书局的创始人,在创办中华书局前,或多或少有与出版相关的经历。这种经历也为中华书局打下了根基,奠定了基础。陆费逵的出版生涯,追溯于上海。初到上海的陆费逵本想东渡日本留学,后来受昌明公司的邀请,便担任了该公司上海支店经理兼编辑。后任职于文明书局,曾与俞复、丁福宝等编辑《初小国文读本》《初小修身读本》《初小算术读本》等教科书。教科书内容令人耳目一新,但因为资金不足,仅出版了三四册,未能出全。

陆费逵在文明书局任职期间,因时常和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一起出席上海书业商会会议,而受到高梦旦欣赏。高梦旦发现陆费逵不仅能掌握印刷发行事宜,而且对编辑工作也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可称为出版界的全才。经高梦旦力荐,商务印书馆以高薪聘陆费逵入职,历任编辑、出版部长兼交通部长,以及《教育杂志》主编、师范讲习社主任。由此也可见商务印书馆对陆费逵的重视与陆费逵的才能。

从文明书局到商务印书馆，陆费逵在这两家单位任职期间，陆续发表了许多有关出版与教育的研究论文。1905年发表《论设字母学堂》，主张注音字母与语言统一。1906年发表《中国书业发达预算表》《著作家之宗旨》《论国定教科书》等文章。担任《教育杂志》主编之后，陆费逵在该杂志上发表了更多关于教育研究的文章：1909年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三种初等小学与高等小学衔接办法》等文章；1910年发表《论今日学堂之通弊》《论各国教科书制度》等文章；1911年也发表数篇相关文章。<sup>①</sup>这段工作经验不仅使陆费逵对教育学有了更深入的研究，丰富了他的出版经验和素质，更重要的是，使他对我国出版界有了独特的认识和理解。

面对“堂堂大中国，竟无一完全自立之书籍商”的现状，陆费逵创立了中华书局这样一家“完全华商自办”的出版企业，其初衷也可了然。陆费逵进入商务印书馆以后，创办中华书局之前，就曾“在馆外与人合谋，私编小学教科书全套”，且在报上“登广告号召”。对于员工在馆外私印教科书的行为，商务印书馆是十分忌讳也是严令禁止的。陆费逵无视公司的规章管理制度，偷印小学教科书的行为，也可体现其自创公司、另起炉灶的志向。这也是中华书局得以成立的主要原因。

中华书局成立之时，陆费逵力辞商务印书馆。可以说，有了陆费逵的坚持才有了后来的中华书局。

<sup>①</sup>何璐琴.中华书局中小学教科书出版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2:6.

## 二、近代中华书局教科书出版概况

1912年建局之初,中华书局用“教科书革命”为口号,以编印适合共和体制的全新教科书为主,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建局不久,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得到迅猛发展,在国内出版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建局之初,以陆费逵先生的“教科书革命”为追求,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以编辑出版各类教科书为主,很快成为教科书出版的重要基地之一,为我国教育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当前,关于教科书的概念多种多样。《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教科书是“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订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sup>①</sup>《辞海·教育心理分册》中,教科书“也叫‘课本’,教材之一,指按照教学大纲编选的教学用书。”<sup>②</sup>《现代汉语词典》中,教科书是“专门编写的为学生上课和复习用的书。”<sup>③</sup>

石鵠先生认为:教科书作为一种教育工具和教育资源,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课程实施的载体,在整个学校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它是国家意志、民族精神、传统文化和学科发展水平的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手段,是教学、考试的重要依据。特别简单而又重要的是,教科书是读者最多,

<sup>①</sup>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76:145.

<sup>②</sup>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教育心理分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

<sup>③</sup>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571.